

下党展翅高飞

——福建寿宁下党脱贫攻坚口述

口述人：项忠红，女，1977年出生，福建寿宁人。2017年起在寿宁县下党乡工作，曾任下党乡乡长、乡党委书记。现任宁德市寿宁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，党的二十大代表。

刘明华，1958年出生，福建寿宁人。1987年起在寿宁县下党乡工作，曾任下党乡党委副书记、乡人大主席团主席。现为寿宁县下党乡“难忘下党”主题馆讲解员，福建省委党校、宁德市委党校、寿宁县委党校兼职教师。2021年被福建省委、省人民政府评为“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。2024年4月，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。

访谈组：胡颖廉 陈 思 王道勇

日期：2024年11月9日、12月10日—11日

地点：宁德市委党校（行政学院）下党分校（院）

“流放”

刘明华：1988年，习近平同志来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，他经常说：“我们宁德是‘老九’，宁德一边挨着福州，一边挨着温州，都是富庶之地，但在这儿就‘短路’了。宁德靠海，但不是有沙滩的海，大部分海岸线都是悬崖峭壁，往里面走全是大山。”这一句话道破了宁德当时的尴尬处境——我们福建省9个地市，宁德无论GDP还是人均纯收入当时都排在全省最后一位。宁德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，当时也被称为中国“黄金海岸线上的经济断裂带”，因为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沿海地区是最先发展起来的，宁德的左右两边是温州、福州，都很发达，但宁德那附不行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。寿宁县呢，又是这个“犄角旮旯”里很穷的一个贫困县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做过我们寿宁的知县，他当年上任路上就走了半年时间，在我们县干了很多好事，青史留名。下党又在寿宁县最边远的地方，是最落后的地方，被称为宁德市寿宁县的“西伯利亚”。1987年，下党还仅仅是一个村，县里派4名同志到下党做建乡的前期筹备工作。我就是这4名同志中的一个，当时才29岁。组织的命令，不来也得来。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当时就像是被流放的感觉，我来后连续哭了三个晚上。记得那天，我们4个人背着被褥往大山深处走，脚下踏着崎岖的、没完没了的山路，一直走了一天，筋疲力尽。我越走越疑惑：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？这里怎么生活？终于走到了下党，这里是群山环绕的一个“锅底”。看着这里与世隔绝、卫生脏乱、人畜混居，村民衣衫槛楼……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。

我们来到下党的第一项工作是筹备建立下党乡。我们先在王氏宗祠落脚。这个祠堂有5个房间，楼上我们4个人住，拿笤帚先稍微扫一下，铺了简单的床铺。我晚上先打蚊子，打得差不多了，躺下想老家的老婆孩子，哭一会儿，就睡着了。早上起来，召开群众大会、宣传建乡工作、规划并入的村、开展摸底调查。开始没有吃饭的地方，我们轮流在老百姓家吃“派饭”，这家吃一次，那家吃一餐。主食是“地瓜米”，就是地瓜刨成丝，晾干以后当主粮吃。忙了一天，晚上回到王氏宗祠再开个会，布置一下明天的工作。回到房间，打半个小时蚊子，哭半个小时，再睡醒。刚来下党的三天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下党在我们这个地方穷得出名。当时下党的贫困是全方位的：首先卫生条件差，人畜混居，到处都是家禽家畜的粪便，村道不敢走，房门不敢进，泡茶不敢喝；土地极少，如果说整个寿宁县是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，下党就是“九山半水没有田”，除了山上开垦一点风毛麟角的梯田，没有种农作物的地方。“红薯米”就是这里的主粮，配点咸菜，做点菜干充饥，所以每个人都面黄肌瘦；村民以什么为生呢？青壮劳力主要到闽北打工，有的去给人家割草，有的伐木。那时候农民年均纯收入在146—164元之间，这个数字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我们对外就讲“不足200元”。

我们拿着县里给的2万元开办费，进来以后在王氏宗祠搭了一个柴火灶，买了吃饭的锅碗瓢盆，这样就可以开伙了。还在村民家租了几间房子当办公室，置办了办公桌、文具，此外还请村民用篱笆编了几个房间，当招待所和仓库用，购买了一些接待客人的被子、被单等床上用品。

那时群众的精神面貌很萎靡不振，很疲惫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。但他们对建乡还是非常支持的。因为我们告诉大家：建乡好啊，建了乡，就会有一个乡党委、政府，国家会给这里投资，公路会通进来，水电站也能建起来，这样大家就能尽早地摆脱贫困。

1987年12月份，我们召开了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，1988年1月1日，下党乡挂牌成立，下党乡就这样诞生了。下党乡刚一成立，就成了宁德唯一的“无五乡镇”：无公路、无自来水、无电灯照明、无财政收入、无政府办公场所。尽管条件艰苦，我们乡政府的工作也慢慢走入正轨。但当时很多人不想来这里，来了也待不住，几天就走了。下党太穷了，外界的人认为派到这里的干部，要么是没本事的，要么是不听话犯了错误的，否则为什么给弄到这个地方呢？大家普遍有这种偏见，导致更多的干部不愿意来。

我也一样，坚持了很久，总是盼着回去。但是到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，踏踏实实地把留了下来，觉得在这里干一辈子挺好。这两个原因：一是下党的干部群众从来对“发配”的说法嗤之以鼻，反而始终高看我们外来干部一眼，他们接纳我们、尊重我们，支持我们的工作，真诚地希望我们一直留下。这让我对这个地方的父老乡亲、山山水水产生了很深的感情。二是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，这个希望来源于1989年宁德地区地委工作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。

“放炮”

刘明华：1989年1月，下党乡的党委书记更换人选，第二任书记是杨奕周同志。老杨是下党乡上党村人，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很热爱家乡，对工作很有激情，心直口快，性格耿直。我当时是党委副书记，跟老杨搭班子干活儿。

那是在1989年6月份，我们宁德地区召开了一次地委工作（扩大）会议，叫作三级扩大干部会，也就是扶贫的套会。当时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，我们地区、县、乡领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。在我们寿宁讨论组开展讨论的时候，参会人员纷纷针对扶贫工作的各个方面发表见解，一条两条三四条，举一反三，铺平垫稳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当时的寿宁县委书记汇报了寿宁的情况以后，老杨突然站起来“放炮”了：“你们整天讲扶贫，我们下党这么贫困的地方，领导都不来，还讲什么扶贫？对贫困地区，上级要关心，要扶贫。”习近平同志听到老杨的话，非常重视，当场跟他约定：“我一定要去下党一趟。”

老杨回来跟我说了这个事。我说：“你就讲这两句？”老杨说：“是，就这两句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炮放的，光有响声，没有实际内容。习总书记成天要处理那么多事，你就讲了个‘我们穷，希望领导来看看’，他怎么记得住？”老杨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应该去找习书记，具体汇报乡里的情况。”老杨说：“我怎么敢去？”我说：“你都敢‘放炮’，怎么不敢去？”老杨说：“我普通话讲不好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你汇报，我给你补充。”

说去就去。我们第二天处理一下手头的事，做了准备，第三天就赶到宁德地委。习书记非常热情，听说我们来了，从三层跑到楼下接我们。他见到我们，笑容可掬，握手问好，带我们上楼。我们坐在那儿，一聊就是挺长时间。老杨和我给他汇报了下党的很多情况，说当地人曾有“三怕”：一怕生病，二怕挑化肥，三怕养大猪，因为猪太大了，运不出去。至于下党到底有多少贫困、多闭塞，老杨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：有一天，县里的电影放映员来给下党放电影。那天晚上放的是《上甘岭》，银幕上“哒哒哒哒”的机枪声让小孩子以为真的打仗了，等电影结束了，有几个小孩拿着箩筐跑到银幕后面捡子弹壳。习书记听了这个故事，感到心情很沉重。确实，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，改革开放也有10年了，我们宁德地区还存在这么贫穷、落后、闭塞的地方，怎么能不让人心痛呢。谈话结束时，习书

记对我们说：“老杨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一定会到下党去。”

大家都认为是老杨的“放炮”，使习书记决定到下党来看一看。这固然是一个原因，但更重要的背景是：1988年，习书记从福建最发达的厦门调到最落后的宁德当地委书记，下党只是他走过的其中一个地方。实际上，习书记一年零十一个月就跑遍124个乡镇中的123个。习书记一直都要求领导干部要多到基层调研，了解实际情况，掌握一手材料，才能支撑决策。要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，把心贴近人民，哪里最贫困最偏远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。

一进下党

刘明华：1989年7月19日，习书记如约而至，他带领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人，包括民政、财政、老区、交通、计委、水电、教育、扶贫等部门的负责同志，从寿宁县城招待所6点钟出发，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了平溪乡的上屏峰村，之后又用了2个多小时步行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，走了7.5公里沙土路、山路，来到下党乡的下党村。

进入下党乡地界之前，乡亲们就已经自发地迎出来了，他们拎着草药熬的解暑汤，给同志们喝，习书记很感动，他说：“这就是单食壹浆，以迎红军。”

一行人来到下党乡，父老乡亲们都在田洋桥沿路边迎接，大家说：“‘地府’来了！‘地府’来了！”“地府”是当地人自创的一个名词，就是“知府”的意思。下党长期封闭落后，乡亲们没有离开过村庄，对外界知之甚少，所以他们不知道地委书记，把县委书记、县长理解为县太爷，管县里的干部叫“县衙”，管地委书记就叫“地府”。老百姓议论说：“下党还没来过这么大的官”“知府都来了，我们这里的发展就有希望了”。这个场景给习书记留下深刻印象，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，他还回忆起乡亲们说“‘地府’来了！”的场景。

习书记看到了下党难以想象的贫困，他说，“下党不摆脱贫困，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。”当时，下党连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都没有，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旁。习书记到的时候已经浑身大汗、衣服湿透，当地干部在村口廊桥上拉起一块塑料布围成小圈，他在里面拿一桶水，从头到脚冲下去，换身衣服就到对面的小学开现场办公会。

我们事先准备好了一块红纸，用毛笔写上“会场”两个大字，用图钉按在墙上。会场连厕所都没有，城里的同志们要方便怎么办？我们就找了两块板子，在屋外隔了一个空间，又在墙角贴了“厕所”两个字。工作人员把两张学生课桌并排放在墙边，上面铺上一张大花床单，后面上摆三个破旧的藤椅，这就是主席台了。主席台下面，就是学生们长短不一、高低不平的桌椅，供地县领导们就座。我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，以及地区18个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坐下面。主席台上坐三个人，左边是地委书记习近平，右边是当时的地区行署专员，老杨是乡党委书记，被安排坐在中间“C位”。

老杨不敢坐，但习书记坚持要他坐，以示对基层老同志的尊重。老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，但一坐下，他就咻咻地流起汗来了。台上台下都坐着比自己级别高的领导，这让老杨心里非常紧张，他准备了讲稿，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，怕念错字，一边念，手一边不住地抖，不敢抬头。因为天气很热，老杨的汗水像黄豆一样大颗大颗往下滴，大汗淋漓，全身湿透，他拿着一毛巾拼命擦汗，擦完以后塞到抽屉里。习书记一看老杨太紧张了，就安慰他说：“老杨，你慢慢讲，不要紧张。”老杨稍微好了一点，但讲了两句话又开始发抖，习书

记说：“不要紧，慢慢来。”

老杨汇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，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我想到，地区里这些领导同志都是这么早就起床，又走了那么久的山路，这时候肚子肯定饿了，我就跑出会场，打算给大家找点东西吃。我在整个村庄找了一圈，只找到一瓶菠萝罐头。我想，那就放在习书记面前吧。我返回会场，把这瓶菠萝罐头打开，放在习书记面前。习书记看到这瓶罐头，就叫来一个工作人员，轻声对他说了几句话。片刻之后，工作人员找来一个碗，把罐头里的菠萝全都倒在一个碗里，给了在门口的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吃。空的罐头瓶，习书记又拿了回去，倒上解暑茶喝了起来。

本来我们县委书记事先跟老杨说过：“汇报不要超过半个小时。”但是因为老杨紧张，磕磕绊绊，念得又慢，汇报了约一个小时。老杨好不容易汇报完，就赶紧跑掉了。接下来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习书记作了一个比较简短的讲话。他指出下党乡条件很差，非常贫困，这里的群众和干部都很辛苦，他要求下党的干部群众要用“弱鸟先飞、滴水穿石”的精神来建设下党，同时要求地县两级领导在政策上要给下党一些倾斜，资金上要给予照顾。

开完会后，已经是下午1点多，习书记进村入户、访贫问苦后，提出不再原路返回，去现场考察要修的那条路。这条道比上午的进山路难走多了。习书记一行沿着河边走出去，走到下屏峰村，芦苇长得比人还高，老杨拿着柴刀在前面砍，习书记一行拿着竹竿沿着河边走，走了3个小时，10公里。

再进下党

刘明华：回到县城，那天大家走了17.5公里，很多同志脚底、脚趾都走出了血泡。第二天，习书记就在寿宁召集18个地直部门和对对应县直18个单位的干部开会，在一进下党第二天的工作会上，习书记说，“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任何原因、种种情况，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。”

每个部门都要表态，你拿多少钱，他拿多少钱，现场拍板了72万元的建设资金，先为下党解决水电、照明、交通。这是帮助下党摆脱贫困的第一笔启动资金，对于我们有里程碑的意义。修路，是要缩短我们与外界的距离，拓宽视野。修水电站，我们就有用电了。习书记的安排，实实在在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，为下党后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，最重要的是，给乡亲们种下一颗决心摆脱贫困的思想种子。

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，乡干部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，都在想怎么用好这些钱。72万元虽已经是一笔巨款，但对于我们要开展的项目来说还是很紧张。

32万元用来修路，压力很大。所以有限的钱必须集中起来做必要的事情，其他的交给群众。除了购买必需的钢筋、水泥、火药、机械设备，土方工程全部由沿路村庄分为68个生产小组分工完成。村民们开发这条路的愿望非常强烈，主观能动性很强，饭都是带到工地上吃的。到1991年1月，只用了一年左右，下党就修通了第一条全长9.3公里的出乡公路。

40万元用来修水电站。一开始，乡里没想自己修水电站，而是提出从邻近乡镇拉电线过来，认为这样见效快。习书记听完，看着溪水想了想，拉电线、架电线，我看还是算了，下党的水资源这么丰富，拉电线看起来快，但背上了电费的包袱，我觉得还是给你们抱一只会下蛋的母鸡（修建水电站）吧。任务艰巨，资金紧张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把最初规划共计500千瓦的2台机组，改为先装1台，发现也够用，那就先这样。从实际出发，必须用好每一分钱，做最要紧的事。到1991年12月，水电站修好了。

习书记要求我们集中力量把修路、修水电站这两件事办成。道理很简单，我们没有什么多财力。但办成这两件事是为我们解决根本问题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了“增强脱贫后劲”的刀刃上，这才打下了足以谋长远的基础。这两件事都是上级支持和自己努力相结合取得的成果。习书记说，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求诸己。也就是说，要有主观能动性，自己先行动起来，“以干帮助”，而不是等靠要。他还说，下党不要多报项目，把这一次研究的几个项目做好，“滴水穿石”！

这一年，下党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。离开下党乡仅仅几天后，习书记又陪同福建省省长一起冒着大雨，走了3公里山路，蹚水1个多小时赶到受灾最重的下屏峰村察看灾情，慰问受灾群众。当时，芹洋乡溪源村到下屏峰村的机耕路被洪水冲毁，基本看不到路坯，只能沿着坑坑洼洼的河道岸边向上游跋

涉，时不时要踩石头垫脚。中间有一段是独木桥，要手脚并用的、手按紧山边的石头，脚踩住木桥一步一步往前移，湍急的溪水就在脚下奔流。

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习书记明白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，仅靠乡亲们自己无法渡过灾情，所以他从宁德的财政里出钱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1500元救灾款。又另拿出15万元资金，用来修路、修坝、修学校，帮助下党修好“生命之路”，重建家园。

第三次来下党时，习书记已经到省委工作了。一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又到了下党。7年来，我一直牵挂着下党。”时隔7年再次到下党村考察，习书记说，把特困地区的工作搞好，一方面靠自力更生，另一方面要靠大家的帮助，有关部门各级干部要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、关心、支持和照顾。这次来，他到下屏峰村察看灾后重建点、防洪堤工程，一路上和乡亲们互相问好。离开村庄时，乡亲们自发放起鞭炮欢送他。听了乡党委汇报，习书记给下党拨款100万元修桥、铺路、发展生产。他说，这100万元交给你们乡里分配，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，实事求是，把资金用在刀刃上。100万元是多大的一笔钱！当时，乡政府报告了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，习书记看后就签了字，现场办公，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领导。这条路1998年通车，从此下党有了第一条省际公路。

习书记给我们修路，解决了大问题，路修通了，发展路子才会活，才有了我们后来的发展，让下党这只“弱鸟”有了“先飞”的翅膀。他给我们钱，给我们支持，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，但同时一直提醒我们，不要急功近利，“不要想一下子抱个金娃娃！”他始终在用10年、20年的发展眼光谋划下党的发展，指导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在长远的产业方面，我们一直强调，闽东的农、林、水电潜力极为可观，水电只开发了5%，水电是基础产业，效益又好，所以，要先把水电办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较少的钱在短期内产出最大的效益，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。他要求，站在当地发展的角度急群众之所急，解决好实际困难，治本、务实。不求多、只求准、只求好，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上，做好一个，再报新的，循序渐进做好打基础、利长远的事情。

“弱鸟”高飞

刘明华：下党的发展果然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规划的那样，稳步向前。1991年，我们的公路修通了，当年年底，电站建起来了。虽然一开始修的公路只有4.5米宽，但是，有了这条路，我们下党人民群众彻底告别了肩挑背驮，我们能更好地抓经济工作了，种茶、种果、造林，我们的产出能运出去，我们的物资能运进来，我们就有条件实现总书记当年说的“靠山吃山唱山歌”。有了这个电，我们就从此结束了油灯照明，我们无论搞旅游，搞生产，还是孩子学习，还是看电视，接触外面的世界，都能满足这些最基本的需求，群众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，精神面貌也变好了，可以走出去了。有了路，有了电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吹到了我们下党，我们后来种食用菌，还有人办工厂，有人经营茶庄，还有很多下党人到潮汕地区开超市，带动了大量老百姓致富。

时间进入党的十八大以后，在乡亲们的努力和政府的扶持下，下党的食用菌产业和茶叶种植产业发展越来越好。群众手里有了积蓄，发展的步伐越走越快。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牵挂着下党的乡亲们，党的十八大以后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了下党。下党这么多年的发展变迁，总书记都知道。

项忠红：党的十八大以后，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，给了我们明确的路线图、任务清单、脱贫标准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，让脱贫攻坚战有了清晰的目标和坚强的动力。下党持之以恒“唱山歌”，抓住党建引领的新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新条件，逐步发展好旅游和茶园两个支柱产业，让下党发展进入快车道。

一个是旅游业。我们讲好“三进下党”的故事，用好总书记曾走过的17.5公里山路这个最好课堂，特别设计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的“四同教育”，让年轻干部重走总书记走过的路，体验当年艰辛，不忘初心使命，深入实地调研。

这些年，我们以“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”为主题，立足下党实际，打造了党的作风建设展示基地、群众路线教育基地、摆脱贫困示范基地和乡村振兴实践基地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下党贯彻总书记思想在各方面取得的发展和进步。来的研学团很多，目前接待都采取预约方式。

（下转4版）